

中國文化的教與學：海外薪傳

梁元生

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

一、兩次不同的經驗

文化的傳遞既受到時代的影響，也受到環境的影響。我在香港接受中國文化的教育，二十餘年前我的老師教我的方法，二十年前我教我的學生的方法和今日的大學、中學，也已經有了許多改變。今日的學生和二十餘年前的學生，也有許多地方不同。但是無論時代如何變動，在香港中國人社會裏討論中國文化教學問題，是一個「文化內」的問題。我們自身是中國人，學生是中國人（我並非從護照的顏色上說的），向自己人傳授中華文化自然和向「文化外」的人傳授中華文化有顯著的分別。

面對這樣一個問題，我有兩次經驗。嚴格地說，只有一次半的經驗。

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裏去傳授中華文化，我有四至五年的經驗。1989至1992年，我在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教書，並開辦「亞洲文化」部，《中國文化》課程由我策劃和施教。此外，我還參加了加州州政府教育廳中學社會文化科課程改革的諮詢小組，為「亞洲文化傳統」部分提供一些意見。

另外一次在海外傳授中華文化，是1982至1988年在新加坡參與編寫《儒家倫理》課程，因為新加坡四分之三的人口是華人，所編課程也有一半是用中文寫的，所以薪傳的工作只能算一半是「文化外」，另一半還是屬於「文化內」的。

二、文化傳承的三個模式

「文化內」及「文化外」的傳承模式有明顯的分別。以中華文化而言，在中、港、臺，乃至新加坡華校的教導，可以採用直溯原典的方式，而許多文化觀念、習尚、價值，不用一一解釋，因為「文化內」的許多體制如家庭、宗族、傳媒，已經替我們做了一部分傳遞的工作。而在「文化外」的教導，則缺乏此搭配與協調的支持系統，所以教學時要照顧的，除了傳授（清楚的解釋）之外，還要接合和比較（即中華文化與該地文化展開對話）。以下我嘗試用三個文化傳承的模式，再從「文化內」、「文化外」不同的角度，討論中國文化的教學問題。

甲、繼承的模式 (The Inheritance Paradigm)

繼承模式，是「文化外」教學與傳遞常用的模式。所謂繼承，包含繼承祖業、繼承

遺產、家內傳承的意思。毫無疑問，在繼承模式下，沒有銜接時的「合法性」爭論，也沒有內外之別。換言之，不需要去說服繼承者為何是「我」而不是「他」去接受這些文化遺產。在香港、大陸和臺灣，我們不必大費唇舌去爭取開辦中國文化課程，其故在此。然而，繼承模式也有問題，因為如同繼承祖業一樣，籠統全收，內中難免有用無用，良莠不齊。有可供利用之金銀細軟，也有需要揚棄的廢物雜料。用於教學而言，此一模式強調接納、強調記誦，其利是能盡量維持原貌，其弊是不求發揮批判的思考。對學生而言，往往淪為記誦之學，失去生趣和現實精神。

今日的教師已多注意到此傳遞方法的毛病，並不求學生強記死背，而希望傳統並不是家傳的纏腳布，既長又臭，一無可取。但當我們傳給學生一些價值觀念或一些史事史迹時，如果目的是叫他們死守善道和牢牢記住，而不是加以分析，仍然會墮入此繼承模式的窠臼。

乙、認同的模式 (The Identification Paradigm)

甚麼是認同的模式？如果說繼承模式只可以在「文化內」找到，認同模式則可在「文化內」及「文化外」都能應用。

在前者，認同可以是民族和血緣上的，也可以是文化和情感上的，因為認同中華文化，所以傳授中華文化；但認同不同於繼承者，乃在於一種自覺。由於自覺到對這文化傳統的需要，因而去認識、去傳遞。繼承模式中可以有「讀之不求甚解」，「先背熟，後明白」，但認同模式則不容許含糊不清，有認識才有認同。職是之故，認同模式的教學可以不依賴原典、不講求記誦，但講求對本質的了解，並因此而產生的一種企慕之情或使命承擔 (emotional commitment)。在「文化內」使用認同模式去教授歷史文化，往往會注入一些民族情感 (national pride)，西方之 Heritage History 庶幾近之。在「文化外」去用認同模式，則有時會牽連到一些歷史淵源或外來因素，例如韓國、新加坡及日本等地教授儒學與認同儒學，不是要去認同中華民族，此種認同與共同的歷史和與西方的對抗都有關係。

丙、整合的模式 (The Integration Paradigm)

在西方教導中華文化，勢難從民族情感或歷史傳承的觀念出發。首先要做的，當然是確定中華文化為人類傳統文明的一個分支，對社會進步、器物技術、宗教精神、經濟發展都曾有過貢獻。既確定了其有可教、可學的價值之後，才可以討論教甚麼、如何教的具體問題。在許多西方的中國文化課程中，都不會把中國文化作為一個自己完成的體系去處理，意即不去強調許多中國文化上的獨特之處 (uniqueness)，注意其通性 (universalities) 而非殊性 (particularities) (而這些獨特之處又往往是構成文化認同及身分的條件)，而去尋找中華文化與西方傳統及現代價值的兩大接合點。所謂整合的模式，就是把中華文化透過在這兩個大接合點上，提到課本和學生的日程上去。整合是透過西方與現代重新認識及作出比較，產生的是啟發性的意義，而非認同

價值，例如有同學提議：在中一至中五，給學生介紹一些「趣味的中國文化知識」，不必等到中六才接觸陌生的中國文化。

於是，我接著想到下列「中學推廣文化知識」各項。第一，可透過中學的課外活動進行。第二，內容必須有趣味，而且簡潔清晰。第三，不要附加功課壓力、考試壓力。第四，表現優秀的學生，給予獎勵，可仿照「愛丁堡金銀銅章」辦法，全港統一推廣進行，成立一個「中國文化獎勵計劃」。第五，由商務、中華、三聯一類的大出版機構，拍攝多輯有趣味的《文化知識錄影帶》，供中學的「中文學會」課外活動使用。第六，推薦一些「課外閱讀書籍」，例如：商務出版的《中國文化史知識叢書》（目前出版至四輯六十種），以及多種有趣味的文化書籍及語文書籍，可以開列一百五十種，學生由中一至中七，自由地選讀若干本。酸甜況味，各有不同，讓中學生自由選讀，一定較現在局限於中六、中七限時閱讀指定的幾本，更有趣味。

（上接頁7）

式的效果。在西方多元文化主義 (multiculturalism) 的立場及背景下討論中華文化，多從這個立場出發。

三、當前香港的挑戰

沒有反省、批判及多元的討論，只依賴領導——無論是政府的領導或市場的領導，是不會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的。我們應該在各種模式或多元討論之中，尋找一個對本地學生最有吸引力及最有啟發性的方法和途徑，把傳統文化延續下去。這不止是保持和維護的工作，也是一項帶著開創和發展精神的偉大工程。